

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特征、挑战与重塑

黄河,周 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当代世界产业分工秩序诞生于二战结束的漫天硝烟之中。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美国构建了由其主导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这一分工秩序呈现出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金融实力为抓手、以科技实力为支撑、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方式、以发达国家间合作为保障等特征。发展中国家在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秩序下难以获得真正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分工秩序不公平,更为倾向发达国家;产业分工结构不科学,更为依赖发达国家;产业分工自主性不强,更为依赖出口市场;产业分工科技落后,更为倾向低端产业。打造植根于多元产业分工视阈下的世界产业分工新格局,构建多元产业分工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多元产业分工是在现有分工秩序基础之上,由相关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经济条件与供给意愿,联合其余发展中国家或部分发达国家打造的更为民主、可靠、安全、智能的产业分工秩序。中国应当在多元产业分工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综合运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结构性权力,将多元产业分工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结合,推动多元产业分工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产业分工秩序;多元产业分工;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F1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21)01-0067-12

世界产业分工这一概念伴随着工业革命以来贸易、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得以形成。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产业分工被逐步纳入到美国主导下的产业分工秩序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分工秩序也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将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都接纳进来,从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 2008 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开始面临极大挑战,欧美等发达国家内部反对全球合作的孤立主义、反对精英政治的民粹主

义等倾向有所抬头。例如,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将比 2019 年的 1.54 万亿美元下降近 40%,这也是这一数据自 2005 年以来首次位于 1 万亿美元之下^[1]。与此同时,由于旧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建立在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贸易结构单一、产业升级困难、科技水平落后、议价能力较低等多方面问题也变得更为突出。因此,构建产业分工地位更为平等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以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成为当下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迫议题。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在世

收稿日期:2020-12-18

基金项目:复旦—拉美大学联盟 2020 年度课题项目“中资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国际化发展”(FLAUCIDEALABMXPE 2005)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周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界产业分工秩序的重塑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构建科学化、民主化、平等化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不仅可以对冲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世界经贸合作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领域,新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还将发挥更为积极的基础性作用。

一、世界产业分工理论的发展

哥伦布发现美洲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500多年来人类彼此间的生产、贸易等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美洲的黄金、亚洲的香料充斥着欧洲市场,英、法等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世界产业分工也由此开端。产业分工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际贸易理论本身就涉及产业分工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因此,世界产业分工理论的发展轨迹可以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中部分内容的梳理而得以阐释。

(一)传统产业分工理论

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式诞生。在这本书中,斯密详细解释了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的产生原因: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有利^[1]。随着欧洲国家间贸易的不断发展,斯密的理论受到了挑战。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中,有的国家特别是某些后发国家,与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国家相比,在几乎所有领域都不存在所谓的“绝对成本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因此,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相对优势理论”应运而生。

根据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所描述的内容,假定世界上仅存在两个国家与两种商品,其中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中都处于劣势,但是因为“相对成本优势”的存在,该国家仍然可以

通过分工,生产自身具有相对优势(也即两劣相权取其轻)的产品,并与另一国家具有相对优势(也即两优相权取其重)的产品进行交换,从而可以达到两国利益的最大化^[2]。进入20世纪,世界产业分工迎来新变化。传统的分工理论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分工现实的解释力面临极大挑战。在这一形势下,以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Filip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n)为代表,提出了“赫克歇尔—俄林原理”(The Heckscher-Ohlin Theory),即“要素禀赋理论”(Factor Endowment Theory)。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各国可依据各自生产的禀赋差异,生产那些需要更大比例地利用自身较为丰富、低廉的资源禀赋的产品,而进口自身较为缺乏、昂贵的资源禀赋所生产的产品。这一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产业分工的发展,并且直到如今依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在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便是遵循这一理论,从而为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

(二)当代产业分工理论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迎来极大变革,世界主要国家虽分为美苏两大阵营,但是随着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迎来独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相应地,世界产业分工的理论也出现了较大变化。

国际贸易领域首先出现的理论发展便是“里昂惕夫之谜”(The Leontief Paradox)的提出^[3]。所谓“里昂惕夫之谜”是指,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理论,美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劳动力成本最高、资本要素禀赋最为丰富的国家,应该主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通过梳理有关贸易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美国出口量最大的居然是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量最大的却是汽车、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

随后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于1966年提出“产品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对“里昂惕夫之谜”进行了初步解释。弗农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改变对有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分工现象进行了阐释。根据他的理论,可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3个时期,不

同时期的产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会出现与“要素禀赋理论”不一致的情况^[5]。

除此之外,二战以来,涉及世界产业分工的理论还包括“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技术差距理论”“差异产品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6]。以上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解释了当代世界分工的新变化、新发展,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主要还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视角解释世界产业分工现状,更多侧重解释某些具体产业、具体部门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劣势;并且以上理论无一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研究世界产业分工问题,对于当今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缺乏来自政治经济学角度的批判^[7]。例如,这些理论范畴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分工的一个重要洞察:分工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社会分工,一是企业内分工;社会分工由市场机制主导,企业内分工由企业机制主导^[8](P305)。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分工主要体现为一种企业内分工:多种因素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崛起。一方面,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使得“社会内部的自由的、似乎是偶然的、不能控制的和听凭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的分工”开始转化为“工厂内部的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规则的、在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的分工”^[8](P356)。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时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的生活资料(用于工资)和原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8](P560)马克思这段话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机会实现出口升级,积极应对跨国公司在建立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造成的挑战^[9]。

二、美国霸权与战后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的构建

如前所述,世界产业分工秩序概念发端于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国由彼此分隔的封闭状态,逐步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这一历史进程。世界产业分工秩序最初仅仅描述的是一种经济现象,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10]。但是随着19世纪以来资

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突出表现为各资本主义强国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构建以“宗主国—卫星国—殖民地”为主要特征的贸易与生产分工结构^[11]。因此这一阶段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充斥着政治因素的影响。随着二战的结束,美苏两国形成两大对立集团,美国通过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推出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机构,进一步确立了其世界产业分工中的优势地位。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构建的这一套金融、贸易、生产体系,成为世界范围内产业分工的主导秩序。

需要看到的是,目前各国所普遍接纳的产业分工秩序,更多地体现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这一分工秩序本质上是不平等、不民主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2]

(一)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产业分工

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繁荣和财富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真正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产业分工秩序^[13]。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和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和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14]吉尔平其实把本质性的问题掩盖了,因为英联邦特惠制实质上是一个由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一体系仅对英国及其前殖民国家和地区开放。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成立国际货币、贸易组织的初衷就是针对英联邦的特惠制。鉴于特惠制已被英国视为其国家核心利益,美国出于冷战背景下美英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尽快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考虑,决定对其采取灵活手段,最终与英国就特定领域削减或取消特惠制达成共识^[15]。

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工

绝尘的综合国力,美国倡议参加筹备联合国的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称“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署的文件为基础奠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The Capitalist World Monetary System with the US Dollars at Its Center)^[7],简单地说,这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是:各国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而美元汇率与黄金挂钩。美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流通与储备货币。同时通过打造配套组织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进一步推动美元在全球的结算和使用,并且为美国富余商品的出口提供配套支撑。

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霸权。依托金融霸权,美国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大肆收购、投资有关产业。金融资本可以很方便地跨越国界全球流动,快速集结,快速撤离;并且由于金融资本具有短期、流动和集中性3大属性,在金融资本面前,产业资本天然处于劣势,难以掌握定价权,只能被外部定价,利润的大头被金融资本抽走。二战前世界各国掌握的资本以产业资本为主,各国主要都在自己的国界范围或殖民地范围内谋发展。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成功利用“金融+科技”的模式谋得了更大的发展,由华尔街统领全球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需要关注各国的内部情况不同,金融资本所面临的掣肘较小。因此在金融资本的主导下,世界各国的产业利益不得不接受金融资本的整编,分成上下游合作的价值链,用来创造最大化的利益,这就是当代全球产业分工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见,美国通过其二战结束后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推动构建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基础上强化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性地位,为打造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分工秩序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主导下的产业分工的特点

美国作为世界产业分工的主导国家,其主导性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0%以上^①。与此同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快,经济增速超过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超过3亿的人口,决定了其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重要话语权。

2.以金融实力为抓手。虽然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但是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依然稳固。目前欧元、日元、人民币等都缺乏挑战美元的能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美元目前仍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88%左右^[8]。通过量化宽松等措施,美国可以轻易将自身发展问题转嫁给其他国家,从而维护其超脱的国际地位。并且近乎无限的美元供应,有助于美国企业收购全球优质资产,推动其海外投资的进行。

3.以科技实力为支撑。美国作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科技实力在全球目前仍然傲视群雄。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高水平大学,而且其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对科研投入都十分重视。美国通过不断推动国内研究机构发展,为相关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在高科技、互联网、航天、芯片等领域,美国企业拥有强大的贸易竞争力,其中在某些领域做到了几乎占据全球所有份额的地步。如在手机、电脑操作系统领域,美国的谷歌、微软、苹果3家企业几乎包揽了全球所有市场份额。这种垄断优势无疑会给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助力,从而巩固美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主导优势。

4.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方式。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美国有121家企业位列全球企业500强,占比达到近1/4^[9]。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占据越发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跨国公司占世界500强的数量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作为对比,2019年中国大陆上榜的114家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只有不到22亿美元,但113家美国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却高达63亿美元,这一数字近乎中国大陆企业的3倍^[9],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盈利能力仍然不可小觑。盈利能力优秀的跨国公司将

能够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助推产业升级,提高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5.以发达国家间合作为保障。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体系,不仅体现了美国本国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构建相关投资规则、市场准则、法律规范,美国与众多发达国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如美国联合其发达国家盟友,干扰中国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全球的正常运营^[20],从而遏制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话语权、领导权的提高,进而达到维护发达国家共同利益的目的。同时对于先进生产技术的出口,美国也联合相关发达国家,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xport Control, COCOM)、“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等,加以控制。

(三)美国主导下的产业分工面临的挑战

1.美国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竞争。美国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国与科技强国,历史巅峰期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半壁江山;而且其国内人口结构较其余发达国家更为年轻,人力资源丰富。因此,制造业在美国当下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因为唯有先进的、规模庞大的制造业,才能吸纳如此之多的就业人口。而美国金融资本出于全球逐利的需要,将大量资金投入东亚、拉美地区,客观上提高了有关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一方面,东亚、拉美等地区制造业的崛起,冲击了美国本已丧失资源禀赋优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投入到其他国家,虽然为美国提供了丰厚的投资回报,但也导致美国制造业产业资本投入相对减少,带来经济“空心化”问题,从而引发了第二大挑战。

2.美国制造业工人不满加剧。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便开始面临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挑战^[21]。首先是欧洲与日本,其次是中国台湾与韩国,现今挑战则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22]。虽然历届美国政府都试图通过单边施压、双边谈判、多边协商等策略努力维护国内传统制造业的运营和发展,但是其国内传统制造业份额仍然不断降低。大量美国工人由于缺少工作技能,无法参与高科技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美国国内失业工人将承受贸易发展的最大代价^[23]。因此,这部分美国工人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反对者。尽管奥巴马及之后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都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但仍然收效甚微。美国国内这部分工人的不满情绪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客观上导致 2020 年美国大选所表现出的社会撕裂更为严重。

3.美国与有关国家摩擦不断。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产业分工的主导性力量,负有在全球提供充足美元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客观义务。但是这样一来便会面临“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即美国一方面需要作为贸易逆差国,通过源源不断地向全球其他国家提供美元以维持美元的全球核心货币地位;另一方面,美元能够成为全球核心货币的一大要求便是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这又需要美国作为贸易顺差国而存在^[24]。因此,美国政府不断施压中国、日本、越南等国缩小对美贸易顺差,但又不能真正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

4.发展中国家不满加剧。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秩序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构建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产业分工秩序中处于无可置疑的弱势地位。正因如此,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集团就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与交涉,并且承诺对相关发展中国家进行关税减免。但是,以上行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的发展问题,并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关税减免的对象大多是原材料、农产品等,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需要^[25]。

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面临多方面挑战。不仅美国国内怨言颇多,而且影响了美国与相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发展中国家在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秩序下,无疑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三、发展中国家呼唤新的分工秩序

面对欧美发达国家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实现民族复

兴、国家独立,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可无论是通过哪种道路,真正取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屈指可数。选择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新威权主义3种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获得成功的案例,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陷入在发展困境之中苦苦挣扎^[26]。究其原因,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公平、不民主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是其陷入发展困境的一大重要因素。因此,构建更为合理、有序、民主、公平的产业分工秩序,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发展的内在诉求与应有之义。

(一)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分工秩序问题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其中依附论的有关讨论更为深入具体。所谓依附论,其实是建立在“反对现代化理论和批判地借鉴发展主义的基础上”^{[27](P87)}的。本文选取依附论的3种不同流派,分别对当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公正分工秩序加以阐释。

1. 正统依附论:技术—工业依附。所谓正统依附论,是由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提出的。根据多斯桑托斯的观点,依附形态可以分为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3种^[28]。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依附困境主要体现在技术—工业依附领域。所谓技术—工业依附,是指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控制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份额等。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弱、科技落后,发达国家通过掌握先进生产工艺等方式,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而不得不依靠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进行生产;而发达国家通过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又可以投入于先进技术研发,从而进一步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科技优势。

2. 宗主—卫星论:不发达的发展。宗主—卫星论由安德烈·甘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提出。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而造成的^{[27](P93)}。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根源在于从

殖民主义时代至今都没能得到彻底改变的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中国家即使通过与原来的宗主国进行贸易而获得了部分经济发展,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无法自生的。如法国等欧洲国家给予非洲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和资源产品关税减免等待遇,并不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制造业与工业,而是依然依附于发达国家生产。

3. 外围积累模式:中心—外围之别。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他提出,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心国家强加而来的;外围国家生产仅集中在出口和奢侈品两类部门,并且受中心国家严重制约;不平等的分工和交换是中心国家控制外围国家的主要手段^[29]。外围国家处于出口的依附地位,经济剩余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心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参与中心—外围贸易程度越深,则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越少,国家也会越发贫困。

以上依附论的有关解释,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秩序下难以获得真正发展的原因所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世界产业分工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产业分工秩序不公平,更为倾向发达国家;(2)产业分工结构不科学,更为依赖发达国家;(3)产业分工自主性不强,更为依赖出口市场;(4)产业分工科技落后,更为倾向低端产业。依附论的相关理论虽然可以对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的弊端予以说明,但是并不能完全脱离现有分工秩序而找到突破路径。因此,迫切需要更为贴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实际、体现发展中国家诉求的世界产业分工理论来指导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布局与产业合作。

(二)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

发展中国家虽然面临世界不公平产业分工秩序的阻挠与剥削,但是也要看到,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逐步走向世界前台,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中国、韩国,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印尼,南亚地区的印度,拉丁美洲地区的巴西、墨西哥等国,在现有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稳步提

1.发展中国家相对经济实力有所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都有了极大提高。2015年,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发展中国家占据9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按美元计算,新兴经济体(包括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在2012年已经上升到41%,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全球的一半^[30]。中国自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经济总量已经占到美国近7成。

2.发展中国家政治地位逐步提升。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日益成为命运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反贫困、反恐等领域,仅靠少数发达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达成有价值的合作。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G20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逐步超过G7,而G20中拥有11个发展中国家成员^[31]。在2015年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可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文本^[32]。

3.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体制改革的意愿不断增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世界银行、IMF的改革呼声不断加强。在2010年举行的G20首尔峰会上,通过了IMF份额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将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超过6%的投票份额^[33]。2016年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供给之中^[34]。

随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经济、政治能力以及意愿的不断提高,构建更加公平、民主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正当其时。

四、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的重塑——多元产业分工论

所谓多元产业分工,并不是将现有的产业分工秩序推倒重来,也不是构建一套完全独立于现有分工体系的全新分工秩序,而是在现有分工秩序基础之上,由有关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根据自身经济条件与供给意愿,联合其余发展中国家

或部分发达国家打造更为民主、可靠、安全、智能的产业分工秩序。这种秩序力求可以对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秩序进行完善与补充,从而实现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的科学化、民主化、平等化、多样化,并进一步提升安全性。

(一)多元产业分工优势的主要体现

1.产业分工方式更民主。所谓多元产业分工,不仅意味着产业分工的模式更多样、产业涉及的领域更多元,而且意味着在产业分工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也更为多变。各国可以根据各自发展阶段,选择参与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产业分工模式。一方面,产业分工的提出者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可根据自身发展需求,提供相应的产业分工方式。另一方面,作为原来产业分工被动接受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规划和产业升级需求,有针对性地参与相应的产业分工秩序,成为产业分工的主动塑造者。

2.产业分工方式更科学。多元产业分工将摒弃原有美国主导下产业分工的机械模式,不再将单一模式奉为圭臬,而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根据各国产业分工的实时变化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更能切合有关国家发展方向的产业分工模式。同时,对于有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技术、培训、管理等层面的挑战,多元产业分工的提供者将力所能及地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帮助,推动产业分工的共同升级。

3.产业分工方式更平等。多元产业分工也存在上下游产业,这是由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35]。但是与传统产业分工方式中发达国家占据“微笑曲线”^[36]的左右两端的情形不同,新型产业分工方式将能够更好地避免发展中国家间的恶性竞争,从而减少中间环节的利润率损失。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多元产业分工模式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将可以参与不同的产业分工模式,差异化竞争减少了同质性造成的损耗;另一方面,多元产业分工模式下,由于产业分工主导国家的增多,传统弱势国家将可以切换自己愿意加入的产业分工类型,并且在与优势国家谈判时提高谈判筹码,减少优势国家恶意压低价格的可能性。

4.产业分工方式更安全。多元产业分工的存在,克服了原有发达国家一家独大、团结一致,而发展中国家任人宰割、互相竞争的不利局面;同时由于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保守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多元产业分工也可通过有关国家间的团结合作,抵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产业链风险,提高产业链安全性。进入2020年以来,我国一系列“固链”^[37]举措,便是通过与有关国家加强合作,以双边或多边协作的方式,将产业分工所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

5.产业分工方式更多样。多元产业分工将带来更为多样、多变的产业分工结构,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所带来的优势,自由组合、相互协作,取得1+1>2的双赢局面。同时,多样的分工也有利于促进新需求的产生,通过与不同国家的产业合作,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本国产业分工的价值。

(二)多元产业分工面临的可能挑战

1.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掣肘。美国及有关发达国家作为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的主要推动者和获益者,对可能到来的多元产业分工态度将会较为抵触。尤其是美国在自身经济、政治影响力相对下滑的当下,很可能通过联合部分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方式,以阻挠在美国之外新的产业分工格局的产生。美国大选之后,新政府将更为注重联合盟友、团结一致采取行动^[38]。因此,多元产业分工未来将可能面临美国及其盟友造成的较大阻力。

2.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多元产业分工作为现有世界产业分工的有益补充,可以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彼此间的国家利益很多时候并不一致,特别是殖民主义者在离开亚非拉地区时,遗留下了众多边境、民族、宗教问题。以上问题的解决将考验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政治智慧,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冲突性问题。上述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发展中国家间的互信水平,导致对于他国的意图和目的缺乏准确判断。多元产业分工无疑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但是具体到个别产业分工的模式,有关发展中国家间将可能面临龃龉。

3.能力与意愿的不匹配。无论是拥有能力但缺少意愿还是拥有意愿但缺少能力,都会影响多元产业分工的推进和功能发挥。如何界定多元产业分工的成员数量、产业模式、分工内容;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等内容都需要慎重考量。与此同时,多元产业分工将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国际分工改革议程,因此必然会面临艰巨的挑战,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多元产业分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有重要影响的大国,需要在统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9]中,稳步推进我国主导下的世界多元产业分工体系建设。

五、中国与多元产业分工秩序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40],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内国际双循环”成为未来战胜国内外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的方法指引和实践路径,作为国际循环重要抓手的“多元产业分工”将成为中国推动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国际分工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应有之义。

世界产业分工的重塑将不仅仅涉及生产结构的重大调整。根据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观点,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共同构成了四大结构性权力;四种结构性权力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影响^[41]。因此,中国建构世界多元产业分工新秩序也需要从这四大结构性权力入手,只有对四大结构性权力加以综合使用,中国主导下的多元产业分工秩序才能得到长远发展。

(一)安全结构与多元分工

根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权力^[42]。新现实主义学派对此观点进行了发展,认为国家并不会追求绝对的权力,而是追求绝对的安全^[43]。无论根据哪种理论范式,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永远不会过时。因此,中国推动多元产业分工,既需要安全结构提

供相应的坚实保障,与此同时,成功的多元产业分工也会提升中国的安全结构性权力。

1.中国可通过提供相应安全保障,促进世界多元产业分工的发展。所谓安全保障,不仅指狭义上的军事安全、国家安全,还包括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发展安全等新安全理念。中国通过在有关国家建设后勤保障基地、提供海上护航巡逻、派驻维和部队等传统安全手段,可以有效维护地区和平,从而推动地区内国家积极参与中国推动的多元分工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资源储备,以及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为参与多元分工体系的国家提供经济安全、产业安全与发展安全方面的有效保障。

2.多元产业分工可有效提高中国安全结构性权力。通过与有关国家共同发展多元产业结构,一方面有利于直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为国家安全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

(二)生产结构与多元分工

生产结构与多元产业分工的结合最为紧密,多元产业分工就是一种直观的生产结构变革。因此,生产结构与多元分工的相互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深刻。

1.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推动有关国家分工结构的优化升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 7 年有余,经过 7 年的努力,当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无论是“中巴经济走廊”还是“中缅经济走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部分富余产业转移到周边友好国家,周边国家又通过承接相应产业,更好地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相关产业的转移既提高了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又促进了其与中国经济的紧密结合,还减轻了中国国内供给侧面临的压力。通过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产业分工,实现了彼此间的互利共赢。

2.中国可通过参与 RCEP、积极参加 CPTPP 谈判等方式,推动亚太地区多元分工发展。RCEP 作为中国目前参与的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有

助于中国巩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同时 RCEP 对超过 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44]。这一全球最大自贸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及日韩澳新等国都达成了自贸协定,将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多元分工合作。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日韩新加坡等国迅速建立了人员往来“快捷通道”,极大地便利了关键产业合作的开展。与此同时,通过积极考虑加入 CPTPP,将有助于倒逼国内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与相应改革的进行。同时参与 CPTPP 谈判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提升自贸协定水平,推动与有关国家的经济与产业分工合作。

3.多元分工可促进生产结构的积极变化。多元产业分工本就是生产结构的一部分,通过与有关国家的多元分工合作,可推动中国国内过剩产业迁出,同时吸引国内亟需的相关产业入驻。多元产业分工不仅可以避免生产结构的固化,还有利于为全社会创造新的源源不断的产业需求。

(三)金融结构与多元分工

金融结构性权力作为美国构建由其主导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的最重要抓手,已经证明了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中国要想推动构建多元产业分工体系,金融结构性权力不可或缺。目前中国的金融实力与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的金融结构性权力未来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1.通过与有关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目前已经与 13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日本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规模高达 2000 亿人民币^[45]。通过本币互换,不仅可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还可以维护国内币值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有关国家的使用率和认可度。稳定的汇率是多元分工得以平稳推进的基础。

2.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发展银行,推动世界范围金融影响力的提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发展银行的建立都离不开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在这两家银行中也拥有较大影响力。两家银行分别聚焦于区域性、国际性基础设施

等领域的投资。此外,中国在总计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金”中出资410亿美元,占据最大份额。上述银行与储备金的建立,可以提升中国在金砖国家和亚洲地区中的金融影响力,为多元分工体系的建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3. 多元分工对提升中国金融结构性权力具有重要反作用。随着多元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开展,有关国家对中国货币、信贷的需求将快速提升。因此,多元分工的推进可以有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且随着人民币使用量的增加,也有利于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从而进一步推动对人民币的使用和接受。

(四) 知识结构与多元分工

中国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专利申请量也已经多年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申请,一直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1. 中国积极参与对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技术培训。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就是技术与资本,对此,中国通过提供工程技术指导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推动工业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的坦赞铁路到现在的蒙内铁路,中国对于培养非洲地区铁路人才的帮扶政策一以贯之。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会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要求其他国家修改国内法律,从而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出卖未来发展的权利。中国构建的多元产业分工体系将注重提高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从而推动共同发展。

2. 多元分工也会给知识结构带来突破。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堆在巴基斯坦的建设进展顺利。通过为巴基斯坦提供安全廉价的核电,一方面可以促进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推动多元分工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在巴基斯坦运营核电站的相关经验也有利于推动未来我国核电技术的进步。

综上所述,中国通过充分运用自身所具有的结构权力,不仅可以经由多元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而且可以在提供多元产业分工公共产品的同时,反哺国内产业的发展。中国可以并且应当在世界多元产业分工体系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

六、结 论

现有的世界产业分工秩序自诞生之初,距今已经70余年;自其囊括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国家算起,也已经历30年。在特定时间内,美国所主导的这一套世界产业分工秩序为促进世界经济恢复、推动国际分工合作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美国国内对全球化的反对之声越发聒噪,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美国国内拥趸甚众,现在的美国已经欠缺能力也缺乏意愿继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扶持了,现有的世界分工体系也已经逐渐沦落为西方发达国家赤裸裸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机制工具。对于想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幻想通过现有的世界分工体系所安排的道路达成目标只会越发艰难,产业升级的路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定会面临发达国家的阻挠拦截。因此,改革现有世界产业分工格局,构建一个更为多元、民主、公平、科学的产业分工体系,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离开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而单独存在。改革现有的世界分工体系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推倒重来,相反,只有在循序渐进改革现有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多元分工体系才能获得成功。但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建设一个更好更完备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实现发展的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体系。

注: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united-states?view=chart,2020-12-10>.

参考文献:

- [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EB/OL]. <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tab-2,2020-12-10>.
- [2] (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9.
- [3] (英)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 王亚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170-175.

- [4] (美)沃西里·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M].崔书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5] 汪斌,赵张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2003,(6):45-49.
- [6] 李锦,王必达.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一个文献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6):79-83.
- [7] 张苏.国际分工理论流派及其综合[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8):85-90.
- [8]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 蒋琦.浅谈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与国际贸易[J].科技信息,2009,(10):40-41.
- [10] 张建新.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9.
- [11] (苏)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6-87.
- [12]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432.
- [13] 梁亚滨.称霸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4.
- [14]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44.
- [15] 王联合,张翔.美国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战略考量与潜在影响[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0,(1):94-110.
- [16] 刘建华,邓彪.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延续[J].太平洋学报,2010,(1):26-35.
- [17] 孟宪扬.浅析布雷顿森林体系[J].南开经济研究,1989,(4):1-10.
- [18] 施东辉.美元霸权地位是否即将终结[EB/OL].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066677,2020-09-08.
- [19] 2020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EB/OL].财富中文网,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0-08/10/content_372148.htm,2020-08-10.
- [20] 外交部回应美方进一步打压华为等中企:美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EB/OL].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59356,2020-12-11.
- [21] 董德志,金佳琦.贸易战之危与机:美日贸易战史鉴[J].金融市场研究,2018,(4):128-136.
- [22] 钟承扬.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分析与比较[J].现代商贸工业,2019,(8):35-37.
- [23] 梁东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再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5-24.
- [24] 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J].世界历史,2009,(6):4-15.
- [25] 韩瑞珍.西方债权人减免非洲国家债务问题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6.
- [26] 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J].文史哲,2003,(5):144-150.
- [27] 樊勇明等.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28]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杨衍永,齐海燕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08-309.
- [29]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M].高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69+244.
- [30] 外媒:七大新兴经济体超越“G7”世界今非昔比[EB/OL].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gj/2014/10-09/6656865.shtml,2019-10-09.
- [31] 赵进东.中国在 G20 中的角色定位与来路[J].改革,2016,(6):60-68.
- [32] 李慧明.《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J].国际展望,2016,(2):1-20.
- [33] 谢世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投票权改革[J].国际经济评论,2011,(2):119-126.
- [34] 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6-10/01/content_5114550.htm,2020-10-01.
- [35] 孙浦阳,蒋为,陈惟.外资自由化、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J].管理世界,2015,(11):53-69.
- [36] 王敏,冯宗宪.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与技术锁定效应——理论解释与跨国经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9):45-54.
- [37] 邓洲,李童.固链|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国际经验与启示[EB/OL].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304246,2020-09-29.
- [38] 赵明昊.中美竞合|当拜登面对“特朗普主义”[EB/OL].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00035,2020-11-30.
- [39] 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中国谋划新发展格局有何深意?[EB/OL].人民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150840042909899&wfr=spider&for=pc,2020-08-05.
- [40] 为什么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一个国家如此重要?[EB/OL].央视网,http://tv.cctv.com/2018/03/07/ARTIv4iUNIB-Uiy6bef1MVuK180307.shtml,2018-03-07.

- [41] (英)苏珊·斯特兰奇.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31.
- [42]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美)肯尼斯·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7.
- [43] 方长平,冯秀珍.国家利益研究的范式之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J].国际论坛, 2002,(3):53-59.
- [44] RCEP 为全球经济注入正能量[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24/c_1126777259.htm, 2020-11-24.
- [45] 中日两国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10/26/c_129979775.htm, 2019-10-26.

【责任编辑:龚紫钰】

Order of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Reconstruction

HUANG He, ZHOU Xiao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order of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as its core,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an order of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under its leadership. This ord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it is based on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focused on financial power, supported by technological strength, represented by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nd guaranteed by the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difficul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re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urrent order of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This is mostly ascribed to the unfair order of industrial division, which is favorable to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structure is not scientific and more dependent o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is not independent enough but more dependent on export markets.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is backward in technology, and it favors low-end industries.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to build a new order of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based on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ivision.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ivision is a more democratic, reliable, safe and smart industrial division order created jointly by relevan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s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versified division order, utilizing the four structural powers of safety, production, finance and knowledge, combining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ivis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 as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ivision order.

Key words: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order of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diversified industrial divis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eveloping countries